

宋代雕版印刷的發展

尾崎 康

日本帝京大學

文學部史學科

提 要

一般認為七世紀70年代的唐朝社會已有印刷，後經五代至宋初始真正有圖書的出版。以《五經正義》雕印之優異為例，正可看出宋代國子監反覆校訂的嚴謹；惜北宋本的存世極稀。南渡後的紹興前半期，雕印工作多集中在臨安府及其周邊的地方官衙；從版式、刀法，可以看出大半是覆刻北宋本。南宋國子監的開版大約從紹興末年開始。

南宋中、後期是坊刻本的全盛時期，杭州、建安、蜀等地皆大量刻書，譬如《史記》，建刊本除原有的集解本外，開始刊刻加入索隱及正義的三注本。從此，附注本或附宋儒校語、評語等增注本之類的書籍大行其道。

本文關於宋代的雕版印刷，是筆者實地走訪臺灣、日本、大陸各大圖書館調查的結果，同時亦多利用影印本或書影的相互比對而完成的。

關鍵詞：北宋刊本、南宋國子監本、建刊增注本、臨安書棚本

一、前言——唐五代的刻書

印刷術究竟是誰發明的？成於什麼時候？並沒有一個特定對象或肯定的時間，但在庶民生活中，基於拓印的經驗，或許印刷術就在一個偶發的機緣下被創造出來。以目前幾個印刷術起源說中，談到印刷的最早紀錄，大概以神田喜一郎的初唐說最值得信賴。

也就是說唐朝三藏（643-712）中的《華嚴五教章》（約成於677）和《華嚴經探玄記》（約成於690）二書中皆有「如世間印法」一語，可見七世紀後半期，印刷已相當普及了。¹

見於文獻和遺物的唐代印刷品，大約有佛教的圖像、經典、曆書、字書，以及所謂「陰陽雜說、占夢、相宅九官五緯之流」。（唐柳玭《家訓》）

圖書的刊印，則以五代時馮道所刻監本《九經》（《五代會要》卷八）、蜀毋丘裔刻《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宋史》卷四七九《毋守素傳》）為嚆矢，入宋之後始可真正稱為圖書出版的開始。

二、北宋的刻書

（一）宋初的開版

太宗初期，據說已完成《太平廣記》（太平興國六年，981）、《太平御覽》等四大部圖書的雕印，但以當時主要的經書、史書皆未刊印，這樣卷帙浩繁的類書卻已完成雕印，實在可疑。除非像現在仍有部分傳存下來的《開寶藏（蜀版大藏經）》，始可確認太平興國二年（977）確實完成了六六二〇餘卷的《開寶藏》。

統一之後的宋王朝，標榜文治主義，推行科舉制度，故科考用的經史諸書，

1 神田喜一郎，〈中國における印刷術の起源について〉，《日本學士院紀要》，第34卷第2號（1976）；收入《續東洋學說林》，《神田喜一郎全集》第2卷（京都：同朋舍，1983）。高秀燕譯，〈有關中國印刷術的起源〉上、下，《故宮文物月刊》，第6卷第3、4期（1988）。

神田氏之說已發表了二十餘年，其間也兩度收入單行本，但中國方面似乎都未提及。筆者於1991年參與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古典文獻專業所舉辦的學術講座也強調過，同時亦在當時的講義，即《以正史為中心的宋元版本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之序文再度明白記載，也沒有得到任何反應。

神田氏主要是引用《華嚴五經章》，同時指出《華嚴經探玄記》亦有同樣的記載，至1998年，潘吉星一一引用《華嚴經探玄記》，其主張的觀點幾乎完全相同。

潘吉星，〈唐代前期的印刷〉，《中國科學技術史·造紙與印刷卷》（北京：科學出版社，1998），第2編第9章第2節1，頁345。

在經過嚴謹的校訂之後，製成定本，正好利用當時已相當發達的雕版印刷術頒布刊行。根據《宋會要》（輯稿第五十五冊）〈崇儒四·勘書〉、《玉海》卷四十三〈藝文〉、《麟臺故事》卷二〈校讎〉等記載，此刊書事業起自端拱元年（988）約歷十年刻成的《五經正義》，至淳化五年（944）雕印《三史》，其間持續不斷，意即十一世紀中葉，四部中主要的書籍大多已開雕完成。此宋初的大事業，筆者在多年前已大略敘述過。²

當時有宿白氏指出，《宋會要》除〈崇儒〉外，尚有〈職官〉（第六十八冊）、〈國子監〉（第七十五冊）、〈刑法〉（第一六四冊）等卷亦載記，宿白氏又廣搜《玉海》的其他卷、《續資治通鑑長編》、《宋史》、《宋朝事實類苑》、《直齋書錄解題》等書，以及宋元明刊本之序跋、卷首所附刻之開版上表文、中書劄子、進呈鏤版所列銜名等等，舉凡宋太祖以來文獻上可見之北宋歷朝刊本，皆一一列舉之。³

如此嶄新而龐大的刻書事業，在北宋所施行的諸多文化事業中，實具有特別的意義。而這些足堪後世評判的定本，是政府動員科舉出身的優秀少壯派官僚，從四部古籍中擇取適當之書，以宮中優異的寫本為基礎，透過嚴密的校訂，再經由王朝的權威印製而成，故以之與傳存於日本的唐寫本或唐鈔一系諸本相校，雖然仍有些問題，但一般而言，也可說北宋已製定了文獻意義上極為精良的刊本。

其後，富於變化的唐寫本幾全散逸，可供對校的資料亡佚之後，明清時代的翻刻本，品質漸趨拙劣；換言之，後代的刊本即由這些具有權威性的定本覆刻而來，只是經後人不斷的反覆翻刻，最後就成了現在的通行本。其間誤字、脫簡、刪節、竄入之類皆不能避免，因此，像宋元版這樣比較古老的版本，自然成了受尊重的文獻。可是，所謂較具權威性的校訂，其實是以當時（宋人）的思想或學說，甚至是依那個時代的感覺在進行，因此，從先秦至唐的原著，不乏被無奈的改動字句，這可以從日本現存唐鈔系列的本子中比對出來。

（二）現存的北宋本

北宋本傳存至今極少，日本所存大概也屈指可數，多半經由高麗、朝鮮傳

2 尾崎康，〈北宋初期における四部の書の開版〉，《正史宋元版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89），第一章第一節，頁3-8。

3 宿白，〈北宋汴梁雕版印刷考略〉，《考古學研究》（一）（北京大學考古學系，1989），收於《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來；因為靖康初（1126），金人攻陷北宋首都開封時，將書籍、版木之類悉持北去，此《三朝北盟會編》卷九十八所引趙子砥《燕雲錄》有云：

靖康丙午冬，金既破京都，當時下鴻臚寺取經板一千七百片。是時子砥實爲寺丞兼是宗室，使之管押，隨從北行。丁未五月至燕山府。

又《靖康要錄》卷十五云：

靖康二年二月二日，壞司天台渾儀、輪軍前，虜圖明堂九鼎，觀之不取，止索三館文籍圖書、圖子書板。

至建炎三年（1129），金人攻掠杭州之際，《資治通鑑》版木又被掠奪而去。（《金史》卷八十〈赤蓋暉傳〉）

關於日本傳存的北宋本，筆者於1984年臺北召開「古籍鑑定與維護研討會」以〈宋版鑑定法〉爲題發表時，曾用書影介紹過。⁴其後因爲又有一些被審定爲北宋本，故再條列如下：

書名	卷數及冊數	刊刻時間	收藏地
新雕入篆 說文正字	一冊	建中靖國元年（1101） 有高麗國印	日本御茶水圖書館
姓解	三卷三冊	同上，古逸叢書有影刻本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
通典	二〇〇卷四十四冊，三 卷補抄	同上，有影印本	日本宮內廳書陵部
重廣會史	一〇〇卷二十冊	同上，有影印本	日本尊經閣文庫
中說	十卷二冊		日本宮內廳書陵部
御注孝經	一冊	通字缺筆，有影本	日本宮內廳書陵部
文選	存十一卷四冊	通字缺筆	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文選	存二卷二冊	同上	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文選	存二十一卷十四冊	同上	北京圖書館
史記	存卷五-七，一冊	以南宋初期建刊本補配	北京大學圖書館
史記	存六十九卷十一冊		日本杏雨書屋
范文正公文集	二十卷九冊，卷一抄配	古逸叢書三編有影刻本	北京圖書館
新雕雙金	一冊	熙寧二年（1069）	日本眞福寺

4 尾崎康，〈宋版鑑定法〉，《古籍鑑定與維護研習會專集》（臺北：古籍鑑定與維護研習會，1985）。又〈宋版鑑別法〉，《ピブリア》，第85號（1985）。

〔火珠林〕(紹聖 新添周易神殺曆 等殘卷)	一卷	紹聖(1094-7)	日本眞福寺
白氏六帖事類集	三十卷十二冊		日本靜嘉堂文庫

上表記「建中靖國元年(1101)有高麗國印」四書，於北宋版《通典》別卷所收解題〈通典北宋版および諸版本について〉一文有詳盡的介紹，⁵其書卷末鈐有「高麗國十四年辛巳歲／藏書大宋建中靖國／元年大遼乾統元年」朱文長方印記，明示建中靖國元年時書在高麗王府，且「建」字因避高麗國太祖王建諱而缺末筆；《中說》則無此印記，但與上舉四書同鈐有李朝世宗十一年(1429)之「經筵」印，皆是豐臣秀吉出兵朝鮮時(壬辰倭亂，1592)掠奪至日本者。因為《通典》中夾雜許多補刻葉，應是十一世紀中葉刻、同世紀末期修補刊行的本子。

「通字缺筆」，是仁宗初期天聖明道間(1022-33)避明肅皇太后之父劉通執政之諱，其中《文選》分別於2001年春見過故宮本，秋見過北京本，雖然「通」字不缺筆的情形較多，但故宮本有三例(其中一字誤刻為「涌」)，北京本較多，大約五十例以上，而且缺筆清晰可見。

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史記》，南宋初期建刊本一三〇卷二十冊，其第二冊部分補配，為十四行二十七字小字本，避諱缺筆至仁宗嫌名「懣」字止。《范文正公文集》為吳郡范(仲淹)家所傳由緒本，大約刻於蘇軾元祐四年(1089)寫序之後不久。

北宋本的校刻精審，《通典》一書就有許多實例可見，正印證《宋會要》所載校書過程嚴謹的記錄，惜北宋版與通行本之間的對校工作並不完整，尤其是上舉現存北宋本諸書，尚有待研究經學、文學的專家們共同努力。《史記》一書，目前知有北京大學的張玉春氏正在進行校理，期待他的成果能早日發表。⁶

目前也許還有未發現的北宋本存世，由於皆無牌記，只能從字體去判斷，故所謂典型的北宋版字體，佛經不失為一個範例。今所知刻於東禪寺版、開元寺版、思溪版之前的佛經，大約可從以下所列表得知。⁷其中明道二年(1033)刊

5 長澤規矩也、尾崎康編，《北宋版通典》(東京：汲古書院，1980-81)，8卷，別卷。

6 張玉春，《「史記」版本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第四章。

7 此表參考笠沙雅章，〈中國古版經について—宋代單刻本佛典と明清藏經—〉，《奈良縣所在中國古版經調查報告書》(奈良：奈良縣教育委員會，2001)，頁11-25。

《大悲心陀羅尼經》，筆者1999年於浙江省博物館見過，《御注孝經》等與之近似，皆為北宋典型的字體，即採用歐陽詢或柳公權之楷體，端麗而柔媚。

北宋所刻佛經一覽表

刊刻時間	題 名	收藏地
開寶四—太平興國二年（971-7）	開寶藏	
開寶五年（972）	熾盛光佛頂大威德銷災吉祥陀羅尼經	奈良上之坊
雍熙二年（985）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京都清涼寺
端拱元年（988）	金光明經	江蘇江陰縣
？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文物》，1982年
大中祥符六年（1013）	墨書 佛說觀世音經	第12期
明道二年（1033）	大悲心陀羅尼經	浙江瑞安縣
		《文物》，1973年
慶曆二年（1042）	杭州晏家刊 法華經	山東莘縣
嘉祐五年（1060）	杭州錢家刊 法華經	《文物》，1982年
嘉祐八年（1063）	同 重校刊 法華經	第12期
熙寧元年（1068）	同 法華經	
熙寧二年（1069）	？ 法華經	
崇寧三年（110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上海圖書館

三、南宋刊本⁸

（一）北宋版的覆刻——南宋初期的官刻本

上舉北宋本中，《通典》和《史記》之南宋初、亦即紹興前半期的覆刻本尚

8 南宋刊本，綜合以刊刻、補刻以及印行時期、出版傾向、字樣、避諱缺筆、刻工名等相關版式，與書籍本文之內容，區分為前、中、後三個時期，且將前期中之紹興年間刊本定為初期刊本。茲將分期情形表示如下：

分期	前	中	後
項目	初期 1127 1163	1190	1225 1274
帝號	高宗 孝宗	光宗 寧宗	理宗 度宗
諱號	構 目（慎）	惇（敦） 擴（郭）	馴 基
主要年號	紹興 乾道、淳熙	紹熙 慶元、嘉泰、 開禧、嘉定	寶慶、紹定、 純祐、寶祐 咸淳

以上參見尾崎康，〈宋版鑑定法〉，第三章第三節，頁51、尾崎康，〈正史宋元版の研究〉，序章附節三，頁35，「版本學上の南宋の時代区分について」有其詳述。

存於世，惜皆無牌記，但從《通典》覆刻本（存一七四卷三十六冊，天理圖書館藏）的刻工名，可推知約刻於紹興十年（1140）前後。⁹而《史記》（存一〇二卷，其中二十八卷以別本補配，北京圖書館藏）¹⁰的覆刻本雖已不見原刻的刻工名，但其版式所顯示的，和《通典》相同，皆可看出北宋原刊和南宋初期覆刻的關係，意即南宋初期覆刻了許多北宋刊本。

北宋官刻本的版本多由首都開封的國子監保管，用以因應印行或補修之需要。但如前所述，靖康之變，國子監的版本皆為金人掠去，諸官僚家藏圖籍的遭遇也差不多，譬如《資治通鑑》的版本，自元祐元年（1086）新雕以來，一直置放於杭州，《金史》卷八十〈赤盞暉傳〉有云：「遂至餘杭，通糧餉、治橋道，暉之力為多。乃還，載資治通鑑版以歸。」但建炎三年（1129）金人攻陷杭州，也被強行虜走。

宋王朝重建於江南，官僚組織亦行重編，當然，經史書籍的刊印成了當務之急，只是版本幾已蕩然無存，重新校訂出版又耗時耗力，但王國維《兩浙古刊本考》、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三，列舉了各種傳世的南宋初期刊本，其數量之多，十分驚人。以下就影印本或圖錄所見書影，確定為紹興前半期杭州一帶官衙所刊之書，做成一覽表，以供參考。

紹興前半期有牌記之浙刻本（極可能覆刻北宋本）

■ 臨安府			
書 名	刊刻時間	收藏地	圖版出處
文粹一〇〇卷	紹興九年	北京	圖9
漢官儀三卷	紹興九年	北京	續古逸 圖7
群經音辨七卷	紹興九年	北京	
西漢文類三十五卷	紹興十年	北京等	
■ 紹興府			
毛詩正義四十卷	紹興九年	杏雨	影

9 尾崎康，〈宋版鑑定法〉，《古籍鑑定與維護研習會專集》，頁64。

10 有影印本，北京：古籍文學出版社，1955。

■ 兩浙東路茶鹽司			
資治通鑑二九四卷	紹興三年	北京	百衲 圖74
資治通鑑目錄三十卷	同	北京·中央等	
資治通鑑考異三十卷	同	北京	
舊唐書二〇〇卷	紹興	北京	百衲 圖73
外臺秘要方四十卷	紹興	靜嘉堂·北京	圖75
事類賦三十卷	紹興	北京	圖77
■ 兩浙西路茶鹽司			
臨川先生文集一〇〇卷	紹興二十一年	中央·北京	
■ 荊湖北路安撫司			
建康實錄二十卷	紹興十八年	北京	古逸 圖215
溫州州學			
大唐六典三十卷	紹興四年	北京 南京 北京大	古逸 圖104
湖州（無牌記）			
新唐書二二五卷	約紹興七年	靜嘉堂等	百衲 圖66
五代史記七十四卷	約紹興七年	中央	中央圖錄
■ 婺州州學			
古三墳書三卷	紹興十七年	北京	圖86
■ 建康郡齋			
花間集十卷	紹興十八年	南京	影 圖105
■ 明州			
文選（六臣注）	紹興二十八年修	足利等	影 圖81
徐公文集三十卷	紹興十九年	大倉	
■ 黃州			
王黃州小畜集三十卷	紹興十七年	北京	四部

收藏地簡稱與全名對照表		圖版出處對照表	
北京	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	圖（數字）	中國版刻圖錄（圖版號）
杏雨	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	續古逸	續古逸叢書
靜嘉堂	靜嘉堂文庫（東京）	百衲	百衲本二十四史
中央	國家圖書館（臺北）	中央圖錄	中央圖書館宋本圖錄
南京	南京圖書館（南京）	四部	四部叢刊
北京大	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	古逸	古逸叢書三編
足利	足利學校遺蹟圖書館（足利）	圖釋	宋元版刻圖釋一
大倉	大倉集古館（東京）	影	單行影印本

以上所示，皆屬有牌記，且刻於杭州一帶（兩浙東路、兩浙西路、江南東路）之臨安、紹興兩府與各州郡的刊本，其實並不多；另外則有一些雖無牌記，但版式、刻工名有共通性者，至於其他亡佚不可知者恐怕更以數倍計。而由此可窺知南渡以後的艱難時期，在短時間內對刊印書籍有多麼急切。

雖然如此，南宋初期的刊本，無論版式或字體，皆優雅秀麗，就文獻資料而言，存真性亦高。這一連串的刊刻作業，從文字校訂、轉寫上版、以至雕印成篇，其間需要耗費多大的人力與時間，當時如何做到？《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卷四〈監本書籍〉條有云：

監本書籍者，紹興末年所刊也。國家艱難以來固未暇，及九年九月，張彥實待制爲尚書郎，始請下諸道州學，取舊監本書籍，鏤板頒行，從之。

又《玉海》卷四十三〈藝文〉條亦云：

紹興九年九月七日，詔下州郡國子監元頒善本，校對鏤板。

如上表所列《文粹》，卷末刻臨安府紹興九年正月之木記，其中有「今重行開雕」語；意味紹興九年前後，曾用原貯江南的國子監刊本爲底本，令州郡、州學覆刻，而南宋監本則要到紹興末年才誕生。

由於覆刻比較節省校訂的人力，所用底本又是校勘精審的北宋本，存真性高，加以杭州附近本來就擁有大批優秀的刻工，他們刻過北宋監本，也參與北宋末湖州思溪圓覺禪院刻的《大藏經》，而福州《東禪寺萬壽大藏》、《開元寺毗盧大藏》的開雕，亦有部分得自他們的支援，故當國家艱難之際，動員江浙一帶刻工，覆刻大量的書籍也非不可能。《思溪藏》五千五百餘卷大約於紹興二年刻成，所餘版本用在《新唐書》和《五代史記》的刊刻，爲宇文時中知湖州時（紹興六年八月—八年正月）所刻。¹¹而《開元寺版》中，紹興五年至十七年之間，有木記（題記）的經卷特別少，這或許意味著這段時間刻經工作暫停，不過，卻正好和覆刻最盛的時期一致，這種現象絕非偶然。以前舉「紹興前半期的浙刻本」而言，由於皆屬同一時、地所產生的本子，故原刻刻工（含南宋前期以後的補葉較少）可相互流通。據《中國版刻圖錄》的解說，即爲「南宋初葉杭州地區良工」，《通典》的覆刻本也有不少與之共通的刻工，字體亦非常相近。

11 尾崎康，《正史宋元版の研究》，頁503、506、550。

覆刻本的字體當然與北宋原刊本非常酷似，以《通典》和《史記》而言，但經實地比較之後，則知文字特徵即使相同，其形還是有微妙的差異。北宋本的一筆一畫比較圓潤飽滿，有柔雅之感；南宋本則線條較剛直，在粗獷的另一面呈現著遒勁的力道。換言之，當摹寫其形，轉抄至版，然後下刀覆刻時，原本舒緩的曲線常不由自主的形成了銳角；故相對於北宋本的優美溫潤，覆刻本因刀法的關係，毋寧說較規整素樸、稚拙可愛。

而覆刻的字體究竟和原刊比較起來有什麼樣的變化？應可透過版式和字面的比較獲知一二；這只要看原本或影印本、書影即可得知，如「紹興前半期的浙刻本」一表所列諸書，均有相近的特徵，按筆者的看法，這些南宋初期的官刻本應該是覆刻自北宋監本吧！

（二）南宋國子監本的開雕

「監本書籍者，紹興末年所刊」，因為南宋國子監，自「國家艱難以來，固未暇」（前引《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換言之，當覆刻北宋本的急迫性時代結束，紹興後半期以後，臨安的國子監就開始校書出版。不過，所需費用大概仍繼續由杭州附近的茶鹽司、轉運司來負擔吧！

而今並無一可明確指出是南宋監本，故只就現存本來推測，如「兩淮江東轉運司刊三史」（《史記》、《漢書》、《後漢書》）、衢州刊《三國志》、杭州刊「南北朝七史」（所謂「眉山七史」）等書或許就是。

「兩淮江東轉運司刊三史」，向以為是所謂蜀刊大字本，每半葉九行，行十六字，今北京圖書館藏《史記》（劉氏嘉業堂舊藏，影刊本）刊有「左迪功郎充無為軍學教授潘旦校對／右承直郎淮南路轉運司幹辦公事石蒙正監雕」兩行官銜。按同一時代洪邁的《容齋隨筆》卷十四云：

紹興中，分命兩淮江東轉運司刻三史板，其兩漢書內，凡欽宗諱並小書四字，曰淵聖御名。

的確，今存「兩漢書」比比可見欽宗諱「桓」作「淵聖／御名」，高宗諱「構」作「今上／御名」之例，但《漢書》不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殘本八部（原北平圖書館所藏），《後漢書》有全本，但北京圖書館和臺北故宮合起來，連同全本也不過只存六部而已，皆紹興中期「兩淮江東轉運司刻三史版」。但文中「桓」和「構」字缺末筆的情形不少，不過皆可看出是剝掉「淵聖御名」與「今上御名」之後填板重刻的痕跡；而且孝宗嫌名「慎」字也有不少缺筆的情形，顯示三史刊刻不久，因高宗的讓位，以致剝掉三字重刻，故可視為紹興末年

刊、乾道初修補本。

而三史皆大字本，書體碩大，已完全擺脫南宋初期覆刻本的字體，尤其是《史記》，上海圖書館所藏原刻，顏真卿的書風特別顯著。（《中國版刻圖錄》圖版107）

「南北朝七史」似比三史刻得稍晚，因「慎」字自一開始即缺末筆。大概這個時期的官刻本避諱要求比較嚴，但與覆刻本多因襲北宋原刊而缺筆較多的情形不同。

從這些觀點來看《中國版刻圖錄》之書影，如《禮記注》（圖版13）、《龍龕手鑑》（圖版14）、《大宋重修廣韻》（圖版15、16）等，皆屬此一系列，特別是《武經龜鑑》（圖版25），刻有隆興二年（1164）孝宗刊序，實為典型。

此系統的刊本在孝宗淳熙年間（-1189）非常多見，若從字體、版式、避諱到內文等綜合來看，在版本學上，也許可以將此一時期稱為南宋前期。

筆者認為出版於前期與中期之間的「越刊八行本注疏」，是南宋國子監本的代表。當年不惜支援紹興初期覆刻北宋本的兩浙東路茶鹽司，此時再度成為刊刻中心，《周易注疏》（《中版刻圖錄》圖版68）、《尚書正義》（圖版69）、《周禮疏》（圖版70）、《禮記正義》（圖版71、72）、《毛詩注疏》、《春秋左傳正義》、《論語註疏解經》、《孟子註疏解經》等，皆八行，十五-十九字本。《禮記正義》有紹熙三年（1192）三山黃唐木記，《詩》、《禮》刻於前一年，《易》、《書》、《周禮》又更早一點，《左傳》刊於慶元六年（1200）紹興府，《論語》、《孟子》則刊於其後。¹²在此之前，經注合刻的經書類只有單疏本，當注疏合刻本開始出版，不但編輯、校訂的過程要付出相當的心力，而且也不限於國子監向來的形式，此嶄新的注疏本當然備受矚目。

而八行本碩大的字體，溫雅而秀麗，是南宋前期至中期之間的典型。現存本的補刻葉相當多，也許當時刷印的量多，但實際傳存非常少。足利學校遺跡圖書館藏《周易注疏》十三卷（有陸子通題識）、《尚書正義》二十卷、《禮記正義》七十卷，為上杉憲實於永享十一年（1439）捐贈，今已指定為國寶。《論語註疏解經》和《孟子註疏解經》今藏故宮博物院。

12 長澤規矩也，〈越刊八行本注疏考〉，《書誌學論考》（東京，1937），又收入《長澤規矩也著作集》（東京：汲古書院，1982）。

（三）南宋前期的坊刻本

民間書肆的出版業，在南宋初期以臨安興起得較早，但存有牌記者非常少，《中國版刻圖錄》所錄《文選》（五臣注）存二卷（卷二十九，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卷三十，北京圖書館藏）及《抱朴子》十八卷（北京圖書館藏），為現存可見者。《文選》上有：「杭州貓兒橋河東岸開牋紙馬鋪鍾家印行」之木記，此「杭州」一詞，表示是建炎三年（1129）稱臨安府之前所刻，所用字體一如紹興前半期官刻覆北宋本的樣子。又《抱朴子》上有牌記云：

舊東京大相國寺東榮六郎家見寄／居臨安府中瓦南街東開輪經史書／籍鍾
今將京師舊本抱朴子內篇校正／刊行的無一字差訛請四方收書好事／君子
幸賜藻鑑紹興壬申歲六月旦日

壬申，紹興二十二年。

其實地方上早有此傳統，以遠離戰亂的福州建安及蜀地眉山為中心。福州在北宋後期（元豐三—政和二年，1080-1112）完成《東禪寺萬壽大藏》六三三九卷（其中有後來追補者）的雕印，接著又刊刻《開元寺毗廬大藏》六一一七卷。因為其地木材豐富，結集許多名匠，也形成可以從外地預約訂貨的通路。尤其建安在福州的內陸，受其主要用材——梨木之惠，故自紹興中期以後，所刻書的字體，筆畫纖細又略向右上揚，相當獨特，這些刊本目前尚有殘存。如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所藏《史記》，有紹興十年（1140）邵武東鄉朱中奉宅刊木記，版框17.4×11.7公分，是個較袖珍的本子，與宮內廳書陵部藏《初學記》，於字體、版式皆非常相近，甚至連後半部以下字體走樣的情況都類似，有紹興十七年的木記，刊者為「東陽崇川余四十三郎印宅」。由於明記浙江人刊，故與以下將介紹的錢塘王叔邊刊《後漢書》為武夷吳驥校正，亦即浙人於建陽書肆刊印的例子相同。（《楹書隅錄》）

紹興之後的南宋前期後半，建刊本已形成自己獨特的字體，《中國版刻圖錄》解說云：「書體秀媚，字近瘦金體，遒勁有力」、「紙墨版式純係南宋初葉建本風格」。此見《圖錄》圖版159《周易注》至圖版166可知，包括《後漢書》（王叔邊刊）、《史記集解索隱》（乾道七年蔡夢弼東塾刊）、《史記集解》（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晉書》、《唐書》（南京圖書館藏）。

以上這些本子，筆者大半實地調查過，幾乎所有的版框都比紹興時的建刊本稍大，高約十八—十九公分，每半葉十三—十四行以上，行二十四—二十五字。姑不論能否肯定為徽宗的「瘦金體」，但確實有那種感覺。至於「遒勁有力」則

未必，毋寧說是相對於中期的建刊本而言吧，其曼妙而略向右上揚的優美字體，說它「秀媚」或「娟秀」或許比較合適。但也有些書自後半部以下則雕印馬虎，如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之《後漢書》即是。

以上所見南宋前期建刊現存本，大半屬正史，這也許是當時建安出版界的傾向，中期以後的特色則是附刻注。當時除《史記》出現索隱本外，一般三史所刻基本上與前人沒有什麼不同。至於對文本的校勘更是尚未開始進行，故不能說是精審可信的本子。

（四）南宋中期建刊增注本

《史記》自唐初寫本以來，裴駰的集解以小字雙行夾注於本文之中，此幾已成定形，故從北宋至南宋前期，集解本的刊行皆如此，現存至少有十種以上。當建刊本的字體由前期逐漸演變至中期的過程中，附加司馬貞索隱的二注本也在建安的書肆出現了，如乾道七年（1171）蔡夢弼東塾刊本（見《中國版刻圖錄》圖版162.3），有十二處於卷末刻牌記，凡六種形式，其中最具代表性者如下：

建谿蔡夢弼溥鄉親校刻梓於東／塾時歲乾道七月春王正月上日書

（三皇本紀）

五年後，淳熙三年（1176），桐川郡齋（廣德縣）亦同樣出版了二注合刻的官刊本（同《圖錄》圖版129、130），此外就是蒙古中統二年（1211）刊本，但目前只存各三部而已，如此之少，似乎怎麼也無法和後來的三注本連繫起來。不過十五年後，建安的黃善夫三注本問世了，此後，所謂《史記》，三注合刻本已成了常識。

從南宋前期開始出現附注本、增注本，至中期達到全盛，此多出於坊刻，顯示民間書肆為射利，開始出版形式或內容新奇的書籍。

南宋中期建安所刊增注本的典型，當屬劉氏一經堂的附釋音注疏本，以及黃善夫之敬室的三史。此時建刊本最大的特徵就是字體獨特，如前舉附釋音注疏本和三史所刻即是。這種字體是從南宋初期建刊本發展出來的，所謂「秀媚」，就如《書林清話》所強調的「有一種橫輕直重者，謂之為宋字」的說法，而「稜角峭厲」即指字體的右肩上揚成一銳角。

注疏本又附釋音起自建安劉叔剛一經堂刊本，如今僅存足利學校遺蹟圖書館所藏《附釋音毛詩註疏》二十卷和《附釋音春秋左傳註疏》六十卷（北京圖書館存二十九卷）而已，至於是否真有叢刻五經或九經，實在並不清楚。

「附釋音註疏本」於元泰定間（1320-27）刻了十三經，其中包含前舉二經之

覆刻，靜嘉堂文庫藏長澤規矩也氏所謂〈正德十行本十三經註疏本〉，¹³皆為元刊本，但其中有明正德年間的補修葉，字體皆存濃厚的南宋中期色彩，故可能是南宋中期建刊的覆刻本。靜嘉堂有《附釋音毛詩註疏》、《附釋音周禮註疏》、《儀禮圖·儀禮旁通圖·儀禮》、《附釋音禮記註疏》、《附釋音春秋左傳註疏》、《監本附釋音春秋穀梁註疏》、《論語註疏解經》、《孟子註疏解經》凡十一經，均為覆刻本，故雖不能斷言南宋中期之原刊皆存世，但與「八行本注疏」相同，至少易、以及前冠「附釋音」三字之五經，再加上論、孟，總共八經，很可能就是此時建安書肆用新形式的注疏本叢刻而成的。

差不多同一時期，同在建安，代表黃善夫家塾之敬室刊行了《史記》、《漢書》、《後漢書》，據「兩漢書」刊序，知刻於紹熙末至慶元四年之間（1194-98）。《史記》率先加入唐張守節正義，於是三注合刻本誕生了；其後《漢書》、《後漢書》跟著加進顏師古和章懷太子李賢注，不久又出現附有「劉敞曰」之類的《三劉刊誤》，或者《西漢書刊誤》、《東漢書刊誤》，甚至還附刻「宋祁曰」之類的宋儒議論，並於各卷末記「右宋文景公用諸本參考凡所是正並附古注之下」等語。就正史而言，此例前所未見。

現存三史，均屬墨色如漆之較早印本，傳世極少，除狩谷掖齋求古樓舊藏本（今藏北京圖書館、松本市立圖書館、天理圖書館）、上杉家舊藏本（今藏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傳存三史外，唯北京大學圖書館存「兩漢書」。其中求古樓本為原刊，上杉本三史有一部分改刻過，北京大學圖書館本（李盛鐸舊藏）亦然。

於是，刊刻附注、增注之趨勢逐漸遍及四部；另一方面，大部頭的書出現了大膽刪節的節本，其後更將宋儒的注釋或議論以小字雙行的形態插入原文之間。今存南宋中期刊本有《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一〇〇卷（內閣文庫）、《陸狀元集百家註資治通鑑詳解》一二〇卷（靜嘉堂）、《呂大著點校標抹增說備註資治通鑑》一二〇卷（北京圖書館）、《省元林公集註資治通鑑詳節》存四十三卷（北京大學）、《新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存十八卷（北京圖書館）等，《通典》刊有紹熙五年（1194）之牌記。

大幅刪節正史而附刻呂祖謙議論的是《東萊先生十七史詳節》（實為十史），

13 長澤規矩也，〈正德十行本注疏非宋本考〉，《書誌學論考》（東京，1937），收入《長澤規矩也著作集》（東京：汲古書院，1982）。

宋末刊本大概只有《史記》與《東漢書》，元刊本應仍屬覆刻自南宋中期之叢刊本。

唐人文集附刻的傾向尤其顯著，譬如《分門集註杜工部詩》有中期刊本，除宋王洙、趙次公等註外又附刻呂大防、蔡興宗、魚豈所作年譜（《中國版刻圖錄》圖版193，《四部叢刊》）、又宋魏仲舉輯注《新刊五百家註音辨昌黎先生詩集》（圖版194）、陳元龍集註《詳註周美成詞片玉集》（圖版195）皆如是。而於李白、柳宗元等人之詩文集題名上冠「增廣註釋」、「重校添註」等文字，在元刊本亦不稀奇，而覆刻時略改題名冠詞更是一般出版界的常態。

不僅對唐人詩文集如此，對北宋人之詩文集亦如是，譬如黃善夫就刊行過《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中國版刻圖錄》圖版179、180）

附注本、增注本之多，和宋末起經元到明前期的覆刻頻繁有關，而「新入」、「增註」等冠詞也隨時在變，不過新題名往往只在卷首數卷，卷三以後又回復到原刊名稱，故全書來看，首尾題名相異，有時還有數種之多。此外，代表書肆之牌記、木記也會因卷次而異，其實也和即興式的出版有關吧！當然，內容也絕對不可能優異。

筆者以實地調查為主，書影為輔，將所見之宋刊附注本、增注本或刪節本作成一覽表如下：

中、後期建安刊附增注、刪節本

書 名	附增注、刪節者	刊印者	收藏地
附釋音毛詩註疏二十卷	唐陸德明音義	劉叔剛一經堂	足利
附釋音春秋左傳註疏六十卷	同上	同上 (存二十九卷)	北京
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註點校尚書十三卷			嘉業堂
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註點校毛詩二十卷			北京
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註禮記二十卷			南京
監本纂圖重言重意論語二卷	魏何晏集解	劉氏天香書院	北京大
婺本點校重言重意互註點校尚書十三卷			銅劍樓
京本點校附音重言重意互註禮記二十卷		(存卷六一八)	北京、上海
新刊直音傍訓纂集東萊毛詩句解二十卷	宋李公凱		靜嘉堂
史記一三〇卷	集解、索隱、正義三注本	黃善夫之敬堂	北京、上海
漢書一二〇卷	三劉刊誤	同上	松本、歷博、

	用宋祁參考諸本校		北京大
後漢書一二〇卷	同上	同上	天理大、歷博、北京大
東萊先生增入正義音註史記詳節二十卷	宋呂祖謙		書陵部
諸儒校正東漢詳節三十卷	同上	(存卷二十四)	東大東文研
呂大著增注校點三劉西漢書詳節三十卷	宋呂大著		北平
呂大著增注校點三劉東漢書詳節三十卷	同上		北平
石壁精舍音註唐書詳節	宋陳鑑	(存十一卷)	北京、上海
京本增修五代史詳節十卷	宋呂祖謙		北京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詳節一〇〇卷			內閣文庫
陸狀元集百家註資治通鑑詳節一二〇卷	宋陸唐老	蔡氏家塾	靜嘉堂
呂成公點校註司馬溫公資治通鑑詳節一二〇卷	宋呂祖謙	(元刊)	上海
呂大著點校標抹增節備資治通鑑一二〇卷	宋呂大著	(有缺)	北京
省元林公集註資治通鑑詳節一二〇卷		(存卷二十九、三十)	北京大、上海
經進新註唐陸宣公奏議三十卷	宋郎曄，紹熙刊	(存卷十一、二十)	中央
新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解三十卷	紹熙五年刊	擇善堂 (存十八卷)	北京
新編四六必用方輿勝覽四十三、後七、續二十卷	嘉熙三年序刊		書陵部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二十四卷	宋呂祖謙	(存卷一—六)	中央
纂圖分門標題五臣註揚氏法言十卷	宋司馬光等	劉通判宅仰高堂	北京
新刊五百家註音辨昌黎先生詩集四十卷	宋魏仲舉		南京
新刊五百家註音辨唐柳先生文集四十五卷	宋童宗說	(有缺)	北京
王狀元集百家註分類東坡先生詩二十五卷	宋王十朋	黃善夫之敬室	北京
王狀元集百家註分類東坡先生詩二十五卷	同上	魏仲卿	書陵部

這類型刻本盛行的理由，常識上會以為是為了科舉參考之用，但這樣粗糙草率本子真適用於科舉嗎？就不得不令人懷疑了。

(五) 中、後期的官刻本

以上用建刊本的版式、字體、刻工等總體版刻狀況來區分版本時間上所謂的南宋中期，應也適用於官刻本。此時，杭州一帶優秀的刻工還很多，主要是從事與國子監相關的工作。

自紹興、乾道至淳熙中葉，所謂南宋前期，亦即高孝兩朝之後，經世代交替，當初覆刻北宋本的刻工大約已消失殆盡，從前期的後半段開始，新面孔就陸續上臺了。所謂中期，應指紹熙、慶元、嘉泰、開禧、嘉定（1190-1224）這段時間，避諱缺筆至「惇、敦」等（光宗），並及「擴、郭、廓」等（寧宗）。與避諱至「脊、慎」（孝宗）止的刊本，判然有別。

此時新刻不多，《中國版刻圖錄》也只是在接續「越刊八行本」之後，收錄《春秋左傳注疏》（慶元六年，1200，紹興府刊，圖版79、80）、《渭南文集》（嘉定十三年，1220，陸子通刊，圖版37，「游」字缺筆本），以及《東觀餘論》（圖版93、94）而已；但所有的解說皆列有部分刻工名，且云：「南宋中葉杭州地區良工」，字體優雅纖細、左右平整，比前期的筆勢柔弱規矩。

紹定以後雖為後期，但紹定二年（1229）平江府刊《吳郡志》五十卷（臺北，中央圖書館藏，六十冊），其原刻刻工正是「南宋中葉杭州地區良工」，避諱至「廓」字，版式、字體也似中期刊本的典型；北京圖書館同平江府刊的《營造法式》（古逸叢書三編）亦近似。

比較而言，中期顯然以修補國子監本為主，據說南宋初期以來，江浙地區官刻本的板木多藏於臨安的國子監。舉個實例來說，《中國版刻圖錄》收錄九部¹⁴列有刻工名，皆稱「南宋中葉杭州地區補版刻工」。其他像兩淮江東轉運使刊三史，或所謂眉山七史，在現存數十部監本之補刻葉上，皆可見到這些人的名字。

南宋中期刊本，或者同期修補葉的特徵，除了上所述之字體外，版心很明顯為白口、單魚尾，大部分的上象鼻刻字數，而且於百的單位下打一點，這些監本就如註14所舉九部，至元代還補刻過，亦即有南宋前期（含初期）的原刊、中期

14 《經典釋文》，宋刻宋元遞修本，杭州，圖版24。

《說文解字》，宋刻宋元遞修本，杭州，圖版26、27。

《國語解》，宋刻宋元遞修本，杭州，圖版31。

《揚子法言注》，宋刻宋元遞修本，杭州，圖版32。

《沖虛至德真經注》，宋刻宋元遞修本，杭州，圖版33。

《（新）唐書》，宋紹興刻宋元遞修本，吳興，圖版66。

《周易注疏》，宋兩浙東路茶鹽司刻宋元遞修本，紹興，圖版68。

《周禮疏》，宋兩浙東路茶鹽司刻宋元遞修本，紹興，圖版70。

《後漢書注》，宋江南東路轉運司刻宋元遞修本，南京，圖版108。

的補修、至元代再修，至少經過三期的刊刻（也有南宋初期刊本中有同期的補修葉，或元代補修兩次的情形，在此暫不敘及），凡此多顯而易見。

理宗以後至宋朝滅亡（1225-1279）屬後期，此時，一方面持續和金人對抗，一方面又大受蒙古的威脅，軍用耗費極大，加以政爭趨劇，國力急速衰退。因此，官刻本極少，像《咸淳臨安志》一〇〇卷這樣大部的地理書（靜嘉堂藏本，有缺，抄配，四十八冊），編纂、刊行於宋代最末期（咸淳，1265-74），是極少數讓人忘了時局艱困的佳本。其版框闊大（26.5×18.3公分），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字體堂皇，避諱不只缺末筆，連「廟諱」、「御諱」之外，太祖、太宗、英宗、欽宗、高宗、寧宗、理宗等諡號，皆用「犯某宗諱」之小字雙行注代之，可見其執行雕印之嚴格。在《咸淳臨安志》之前有《乾道臨安志》、《淳祐臨安志》各十五卷、五十二卷，現存僅三卷和六卷，內容價值相當高。

寶祐五年（1257）《通鑑紀事本末》四十二卷亦同樣是大型之本，文字比《咸淳臨安志》更闊大，為趙氏宗室刊本，故避諱缺筆十分忠實。此本版本經元西湖書院、明國子監遞修，故殘存頗多。

其他，福州所刻《國朝諸臣奏議》亦有相同的例子，也許因為元軍南下鄂州（武漢）或自西而進，臨安等沿海地區至淳祐年間還有刻書的餘裕。

（六）後期的坊刻本

臨安書棚本

南宋首都臨安城中御河上有棚橋，其旁一條貫通南北的長街叫棚街，棚北大街多書坊，所出版的書稱作書棚本。就如（三）的前期坊刻本所述，臨安書肆自紹興中刊行《文選》、《抱朴子》，中期刊本也有嘉定十三年（1220）序，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鋪刊《歷代名醫蒙求》二卷（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另外，尹家書籍鋪亦印行《搜神秘覽》三卷（天理圖書館藏）、《續幽怪錄》四卷（北京圖書館藏），同為九行十八字，字體亦相近，應屬前後時期的刊本。其後又出現棚北大街睦親坊陳氏刊本，此指狹義的臨安書棚本；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二立〈南宋臨安陳氏刻書之一〉、〈同之二〉、〈宋陳起父子刻書之不同〉三章，考證周詳，眾所周知。葉氏列舉了二陳氏刊本近二十部，長澤規矩也氏採入其書目中，並增補四十五部。¹⁵

15 長澤規矩也，〈宋朝私刻本考〉上、下，《書誌學》，第一卷第3、5號（1933），收入《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3卷。

陳氏刊本有「臨安府陳道人書籍鋪鋪刊行」、「臨安府棚北睦親坊（南）陳解元書籍鋪刊行」、「臨安棚北大街睦親坊南陳宅書籍鋪印」等各種不同的木記，以下為現存十六部有木記者，一部是影摹陳氏刊記影宋本。

陳宅書籍鋪有木記之刊本

書 名	編著者	代 號	行 款	冊 數	收藏地	書 影
高常侍集十卷	唐高適	L	十行十八字	二	大東急	圖釋174-5
常建詩集二卷	唐常建	H	同上	一	臺北故宮 ¹⁶	版刻48-9
周賀詩集一卷	唐周賀	I	同上	一	北京	圖釋179
王建詩集十卷	唐王建	J	同上， 配清抄本	一	北京	
丁卯集二卷	唐許渾		同上	一	上海	圖釋181
朱慶餘詩集一卷	唐朱慶餘	L	同上	一	北京	版刻50-1 圖釋181
李群玉詩集三卷後集 五卷	唐李群玉	AR	同上		研究院	
甲乙集十卷	唐羅隱	C	同上	四	北京	
唐女郎魚玄機詩一卷	唐魚玄機	I	同上	一	北京	版刻52-3 圖釋172
碧雲集三卷	唐李中	I	同上	二	研究院	圖釋185 四部叢刊
李丞相詩集二卷	南唐 李建勳	N	同上	一	北京	版刻54-5 圖釋176-7
唐李推官披沙集六卷	唐李咸用	G	同上	二	研究院	
唐僧弘秀集十卷	宋李 編	P	同上	一	中央 ¹⁷	中央圖錄347 圖釋190 圖釋170-1
唐宋群賢小集存 五十八種九十五卷	宋陳起等 編	BCDE FJOP SUV	同上	六十	中央	中央圖錄351

16 北京圖書館藏二卷一冊同，但無木記。

17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存八卷（卷一一八）同，但無木記。（《北京大學善本書錄》，頁67。）

畫經十卷	宋鄭樵	N	十一行 二十字	二	遼寧	古逸叢書三編 圖釋191-2
賓退錄十一卷	宋趙與時	L	十行十八字	一	北京	圖釋184

收藏地全名	
大東急	大東急記念文庫
臺北故宮	國立故宮博物院（臺北）
研究院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臺北）
遼寧	遼寧省博物館
代號全稱一覽表	
A	臨安府棚前睦親坊南陳宅書籍鋪刊行
B	臨安府棚北大街睦親坊南陳宅書籍鋪刊行
C	臨安府棚北大街睦親坊南陳宅書籍鋪印行
D	臨安府棚北大街陳宅書籍鋪刊行
E	臨安府棚北大街陳宅書籍鋪刊
F	臨安府棚北大街陳宅書籍鋪刊印
G	臨安府棚北大街陳宅書籍鋪印
H	臨安府棚北大街睦親坊南陳宅刊印
I	臨安府棚北睦親坊南陳宅書籍鋪印
J	臨安府睦親坊南棚前北陳宅書籍鋪印
K	臨安府棚前北睦親坊南陳宅經籍鋪印
L	臨安府睦親坊南陳宅經籍鋪印
M	臨安府睦親坊陳宅經籍鋪印
N	臨安府洪橋子南河西岸陳宅書籍鋪印
O	臨安府陳道人書籍鋪刊行
P	臨安府棚北大街睦親坊南陳解元宅書籍鋪刊行
Q	臨安府棚北大街睦親坊南陳解元書籍鋪刊行
R	臨安府棚北大街睦親坊南陳解元宅書籍鋪印
S	臨安府棚北大街睦親坊南陳解元書籍鋪印
T	臨安府棚北大街陳解元書籍鋪印行
U	臨安府棚北睦親坊巷口陳解元鋪印行
V	臨安府大街棚北睦親坊南陳解元書籍鋪刊行
W	臨安府棚前北睦親坊南陳解元書籍鋪刊行

從上表可知大半屬唐人別集，而且版式皆左右雙欄，版心白口，每半葉十行十八字，字體纖細，顯見南宋後期樣式，但木記中有陳解元之名的唐宋總集和屬子部雜家、藝術家的四種為例外。無陳宅木記，《中國版刻圖錄》卻云：「觀字體、刀法，疑亦宋末棚本」者有五，據書影而與前述版式相近者，靜嘉堂文庫有三，宮內廳書陵部有一，臺北中央圖書館有一，凡總集二、詞一、子部雜家和藝術家四。而其中也有陳氏家人陳思所撰宋人法書，子部類的行款不同，為十一行二十字。又影宋鈔本亦摹有陳宅書籍鋪的木記，如陳起編《宋詩秘本十一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書林清話》認為陳起、陳思父子即陳道人、陳解元，但也有不同的看法，「陳道人書籍刊行」之木記，許多書目都有著錄，長澤目就收了七部，但現存刊本卻不見此木記。

無木記之陳宅書籍鋪刊本

書名	編著者	行款	冊數	收藏地	書影
杜審言詩集一卷	唐杜審言撰	十行十八字		北京	古逸叢書三編
張司業集十卷（有卷中下）	唐張籍撰	同上	一	中央	圖釋178
唐求詩集一卷	唐唐求撰	同上	二	北京	版刻58
浣花集十卷	唐韋莊撰	同上	二	靜嘉堂	
河嶽英靈集二卷	唐殷璠撰	同上	一	北京	
東山詞二卷（存卷上）	宋賀鑄撰	同上	一	北京	版刻60、61
書苑菁華二十卷	宋陳思編	十一行二十字	六	北京	版刻57
書小史十卷	宋陳思撰	同上	二	靜嘉堂	
圖畫見聞志六卷卷 一一三配元抄本	宋郭若虛撰	同上 小字雙行	二	北京	版刻56
游宦紀聞十卷	宋張世南撰	同上		書陵部	

《唐僧弘秀集》有寶祐六年（1258）刊序，據劉克莊《後村居士集》所收「贈陳起詩」，知陳起父子仍活躍於淳祐末寶祐初之間（1250前後），¹⁸此所以陳氏刊書棚本於南宋後期亦可見刊印，若包括無牌記者，陳宅刊本現存尚有二十五

18 吳啓壽，〈南宋臨安陳氏書籍鋪考略〉，《圖書館研究與工作》，1982年第7期。又收入《歷代刻書概況》（中國印刷史料選輯，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1991）。

部，不能不說是個異數。¹⁹顯示陳宅雖處南宋國力衰頹之時，在臨安街上的商業活動仍十分活躍。

臨安的書棚，在前期坊刻本一節曾提及貓兒橋河東岸開牋紙馬鋪鍾家、中瓦南街東開印輪經史書鋪，其後又有清河坊北街西面東的趙宅書籍鋪、太廟前的尹家書籍鋪、中瓦子的張家、衆安橋南街東的賈官人宅、錢塘門裡車橋南大街的郭宅紙鋪等名稱出現在木記中。中期以後刊行的書籍，主要是子部的醫、雜、小說和釋家類等書。²⁰

以上的臨安書棚本，大致上多為各別集中最古老的刻本，已廣為唐代文學研究者作為校勘之用，傅增湘曾於《王建詩集》記題「此書余嘗校過，甚佳。」（《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十二）唯墨釘醒目，稍覺彘扭。

（七）蜀刻本

蜀地自唐代起印刷即發達，如東川節度使馮宿的上奏或柳玭《家訓》之類，皆有殘留一些資料可尋，而入宋不久即雕印《開寶藏》五千餘卷，用了十三萬多塊板木。今殘存日本的北宋本《重廣會史》（尊經閣文庫藏）及《火珠林》（《紹聖新添周易神煞曆》）（真福寺藏），從字體上看，最近蜀刊，但有多大的可能性實不敢確定。

就字體而言，就是所謂的龍爪本，字大而峭拔，一如字面的意義，譬如常被推定為南宋初期的廣都費氏進修堂本即其典型，可惜今皆不存，也許可以從同為前期之鄂州鵠山書院覆刻本窺知一二（靜嘉堂文庫、中央圖書館藏）。但《相臺家塾刊九經三傳沿革例》所著錄南宋前期刊《周禮》（靜嘉堂藏）、《禮記》（北京圖書館藏）、《春秋經傳集解》（上海圖書館藏）等八行十六字本，其字龍爪開闊、力道強勁，或許更為接近，所以稱為蜀大字本。

蜀刻本的另一特色一如臨安書棚本，多叢刻唐人文集，其中一部曾於1922年續古逸叢書影刻過，1970年代末，上海古籍出版社又以線裝的形式重新影印，1994年，同社更以北京圖書館藏本為主，合上海圖書館本印成《宋蜀刊本唐人集

19 瞿冕良編著，《中國古籍版刻辭典》（濟南：齊魯書社，1999），「芸居樓」項下，陳起刊本有八十一，陳思的續芸刊本，從其編《江湖小集》、《六十家名賢小集》等列舉，更達百餘之多。

20 前引長澤規矩也，《宋朝私刻本考》。

叢刊》二十三種四十八冊，以洋裝刊行，則其全貌大體可知。即北宋末南宋初刊（稱「北宋或南北宋之際刻」）十一行二十字本三種，南宋中期刊十二行二十一字本十八種，南宋中期刊十行十八字大字本二種。（蜀刊本唐人別集）

蜀刊本唐人別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刊，1994）

北宋末南宋初刊 十一行二十字		
書 名	卷 數	撰 者
駱賓王文集	十卷（抄配）	唐駱賓王
李太白文集	三十卷（抄配，有缺）	唐李白
王摩詰文集	十卷	
南宋中期刊 十二行二十一字		
孟浩然詩集	三卷	唐孟浩然
孟東野文集	十卷（有缺）	唐孟郊
劉文房文集	十卷（有缺）	唐劉長卿
劉夢得文集	三十卷（有缺）	唐劉禹錫
陸宣公文集	二十二卷（有缺）	唐陸贄
新刊權載之文集	五十卷（有缺）	唐權德輿
新刊元微之文集	六十卷（有缺）	唐元稹
張文昌文集	五卷（有缺）	唐張籍
張承吉文集	十卷	唐張祐
姚少監詩集	十卷（有缺）	唐姚合
皇甫持正文集	六卷	唐皇甫湜
李長吉文集	四卷	唐李賀
許用晦文集	二卷	唐許渾（總錄、拾遺2卷）
孫可之文集	十卷	唐孫樵
司空表聖文集	十卷	唐司空圖
杜荀鶴文集	三卷	唐杜荀鶴
鄭守愚文集	三卷	唐鄭谷
昌黎先生文集	四十卷外集十卷（抄配）	唐韓愈
南宋中期刊 十行十八字		
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集	四十卷外集十卷遺文三卷 志三卷（抄配）	唐韓愈撰 宋文謙註 王儔補註
新刊增廣百家詳補註唐柳先生文	四十五卷（抄配）	唐柳宗玄

四、餘 論

官刻本較少別集，與臨安的書棚一樣，個人文集的出版都由民間擔任，但是，建安難道也不出版與科舉無關的作品嗎？因為除李杜韓柳，及宋蘇軾、黃庭堅、朱熹的附註、增注本外，其餘刻本非常稀少。

吳璧雍 譯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odblock Printing in the Sung Dynasty

Ozaki Yasushi

Department of Histor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Teikyō University

Abstract

It is generally accepted that the printing existed as in T'ang China as early as the 670's. After the succeeding periods of the Five Dynasties (907-960) and early Sung, true book printing began in earnest. Taking as an example an excellent woodblock printed edition of the *Wu-ching cheng-i* (Correct Meanings of the Five Classics), one can observe the careful, repetitive proofreading of the Sung's Kuo-tzu-chien (Imperial Academy). Unfortunately, few such examples of Northern Sung printing survive today.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Shao-hsing period (1131-1162) of the Southern Sung (1127-1279), woodblock printing was concentrated in Lin-an (the southern capital on the site of present day Hangchow) and its peripheral areas. The stylistic qualities and carving methods observed in editions from this period suggest that most were re-carvings based on the earlier Northern Sung works. Printing by Kuo-tzu-chien of the Southern Sung started in the late Shao-hsing era.

Woodblock carving by private publishers (*fan-k'o-pen*) flourished in the middle and later Southern Sung, with great quantities carved in the regions of Hangchow, Chien-an, and Shu. On example is the Chien-an edition of the *Shih-chi* (Historical Records), which includes not only the *Chi-chieh* (Collected Explications), but also the *So-yin* (Quotational Commentaries) and *Cheng-i* (Correct Meanings) commentaries. From this point on, editions with commentaries, editorial comments, or critiques by Confucian scholars were very popular.

Keywords: Northern Sung edition, Re-carved edition of the Northern Sung,
Kuo-tzu-chien edition, Annotated Chien edition

※ The article in Chinese appears from page 167 to 190.

※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abstract on page 167 by Paul Cooper.